

XIANDANGDAIXINRUXUE
SICHAOYANJIU

郭齐勇/著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人民出版社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郭齐勇 著



责任编辑:方国根 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郭齐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ISBN 978-7-01-017810-3

I. ①现… II. ①郭… III. ①新儒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1371 号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XIANDANGDAI XIN RUXUE SICHAO YANJIU

郭齐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2.75

字数:500 千字

ISBN 978-7-01-017810-3 定价:8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现当代新儒家为我们确立了一种精神文化的方向。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张君勱、冯友兰、贺麟、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先生等，他们都非常了不起。严格说起来，每一位学问家都有他的贡献与缺陷。现当代新儒家的理论有创新性，当然也有他们自身的限制，这都是难免的。现当代新儒家最重要的功劳，我觉得是指明了中国文化的方向，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明对话中如何发掘和创造性转化本土的精神与文化资源（包含儒释道等），来回应时代的挑战，以及基督教等各宗教文化的挑战。他们面对现代思潮的挑战，在现时代人生存的意义危机与生态危机、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对话等问题上，对传统文化思想作出积极的转化，坚持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本体与主体，这是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之下，在全盘西化的思潮之中，这三代四群十多位现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守先待后，阐幽发微，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要把它坚持下来并对现代世界文明作出中国的贡献。他们既不排拒，也不盲从于西方文化，特别是像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这一代思想家，对西方文化非常精通且有深度的批判。他们三代学者都潜心融会东西文化，在东西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中，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最先强调了文化自觉，挺立了文化的主体性。这样一个学者群落的出现，也是时代的产物。

熊十力是我们湖北人，过去学界连他的生平事迹都不太清楚。在恩师萧萧老师的指导下，我于1982—1984年写硕士论文与1987—1990年写博士论文期间，集中研究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系统，从他的年谱做起，对他的所有资料及前人对他的评论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写了几本关于他的书。应该说，是萧老师指引我走上了学术道路，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他与汤一介先生还指导我

2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与景海峰兄、王守常兄等同仁共同编纂了熊先生的选集与全集。还应当特别感谢方克立先生、李锦全先生,自1986年11月以后的十年,我有幸参加了他们负责的“七五”、“八五”期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新儒学思想研究”课题组,承担了若干工作,得到了锻炼。我的有关著作与编著的出版,与这一课题有不解之缘。

我和我的研究对象熊十力先生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共鸣。熊先生是弘扬中国文化并重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本体与主体的老前辈,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我逐渐地回归传统。我年轻时西化倾向比较严重,后来慢慢地在前辈们的影响下体悟到,我们过去批判中国文化传统,很多东西不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体悟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一些真实内涵。过去我们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受五四以来的批判思潮的影响,把现代人错误的根源都归结到中国文化的传统上,而且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评论,基本上是隔膜的、不讲道理的,不是内在性的批评。后来我们才慢慢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价值。

令人难忘的是1988年岁末,中国香港法住学会霍韬晦先生邀请两岸三地的一些儒家学者齐聚香江,出席第一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萧蓬父先生与我等有幸参加了这一会议。尔后的十多年,我主要关注并从事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工作。这次会议结交的朋友们快三十年了,至今彼此间常有互动,相互支撑,十分难得。唐代志勤禅师有诗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剑客,比喻修行悟道的人。唐君毅先生曾引用这首诗,表明自己在少年时代确立的志向与志业,终身持守,矢志不渝。唐先生早慧,个人万不及一。但个人在中年时代真正领悟了现当代新儒家学者的精神世界之后,也是至今不疑,儒学就是我的生命与生活。

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谢远笋博士帮我整理书稿,他给我写电子邮件说:“这本书是您集一生之力持续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进行研究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人文特征和学术个性。”这话的前一半基本是事实,我个人在这个领域耕耘了二三十年。当然我后来的主要兴趣在先秦哲学,且由于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结题成果,不能不充分吸收课题组成员们的成果与意见,体现了人文社科课题研究的分工

与合作。我请肖雄博士、秦平副教授、丁为祥教授、廖晓伟讲师分别撰写了本书第六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系我与王晨光博士合撰。介江岭讲师协助我整理了部分章节,统了部分书稿,并核对引文。谢远笋讲师协助我整理了部分章节与参考书目,统了全部书稿,并核对引文。他们二人又帮我校对清样。对以上各位及课题组其他同仁的支持与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由我拟定整体研究框架与细目,承担了主要的研究与撰写任务,并最终审订全稿。本书的错误与缺失,理应由我负责,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项成果经教育部社科司请专家鉴定,准予结项,鉴定等级评为“优秀”。是为序。

郭齐勇

2016年五一节于珞珈山麓寓所

2017年元旦修订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背景与走向	1
第一节 文化反省的多维性与五四传统的另一面	2
第二节 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线索与基本内容	7
第三节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及其特点	11
第四节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贡献与局限	35
第二章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	41
第一节 意欲——理性	41
第二节 文化比较模式与人生道路	48
第三节 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	54
第四节 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的意义	63
第三章 熊十力的本体论哲学	65
第一节 体用不二与翕辟成变	66
第二节 性智与量智	74
第三节 性修不二与思修交尽	87
第四节 熊十力本体论哲学的现代意义	91
第四章 马一浮的心性论与六艺论	95
第一节 马一浮的人品与诗品	95
第二节 性德为中心的心性论	104
第三节 六艺论的文化哲学观	109

2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第四节 马一浮的哲理诗与诗性人生	114
第五章 钱穆的历史文化思想	120
第一节 民族与历史	120
第二节 经学与理学	124
第三节 儒学观	129
第四节 钱穆国学研究的贡献与价值	148
第六章 张君勱的哲学系统	151
第一节 宪政思想	152
第二节 比较哲学	157
第三节 理学再创	164
第四节 张君勱的理论贡献	170
第七章 冯友兰的新理学与哲学史	173
第一节 新理学与贞元六书	174
第二节 新理学的内在张力	177
第三节 从正的方法到负的方法	185
第四节 冯友兰的学术贡献及其现代意义	188
第八章 贺麟的理想唯心论	193
第一节 中西文化观	194
第二节 理想唯心论	201
第三节 中国哲学的新诠	209
第四节 贺麟理想唯心论的价值与意义	217
第九章 方东美的比较哲学	220
第一节 世界文化视野中的比较	221
第二节 中国哲学内部的比较	229
第三节 广大悉备的生命哲学	239
第十章 唐君毅的文化哲学	245
第一节 道德自我的挺立与撑开	246
第二节 生命存在的“三向九境”	250
第三节 先秦哲学之新解	255

第四节 唐君毅文化哲学的价值与意义	267
第十一章 牟宗三的哲学系统	270
第一节 改造中学,与现代化相调适	271
第二节 变传统哲学为现代哲学	298
第三节 反省西方哲学,重建本体论	303
第四节 牟宗三哲学建构的意义与启示	312
第十二章 徐复观的思想史观	317
第一节 忧患意识与心性史观	318
第二节 批判精神与庶民情结	323
第三节 礼与乐:道德性人文精神	328
第四节 徐复观的贡献与唐牟徐合论	337
第十三章 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合论	341
第一节 杜维明的启蒙反思与文明对话	342
第二节 刘述先的内在超越与全球伦理	353
第三节 成中英的分析理性与本体诠释	362
第十四章 现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370
第一节 现当代新儒家宗教观概述	370
第二节 唐、牟:道德的宗教	373
第三节 杜、刘:终极的关怀	382
第四节 比较与综合	389
第十五章 现当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	392
第一节 熊、马:乾元性理	392
第二节 方东美:生生不已	396
第三节 唐、牟:神明之知	400
第四节 现代新儒家的易学观的意义	406
第十六章 宋明理学与现当代新儒学	409
第一节 北宋五子的“造道”追求	409
第二节 程朱理学——天理本体之普遍化拓展	417
第三节 陆王心学——道德意识之主体性落实	425

第四节 现代新儒学之返本开新追求	434
第十七章 现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	442
第一节 对传统政治思想的批判	443
第二节 儒学与民主政治	448
第三节 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对话	457
第十八章 中国文化精神及其对现代性的批评与调适	465
第一节 中国文化精神	465
第二节 现代性问题及其反思	477
第三节 中国文化精神对现代性的批评与调适	483
主要参考书目	490
索 引	498

第一章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背景与走向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①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挑战应运而生的、20世纪中国最具有根源性的思想文化的流派,是在现代中国反思与批判片面的现代性(包括全盘西化或俄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在现代中国积极吸纳西学、与西学对话,又重建传统并与传统对话的最有建设性与前瞻性的思想流派。这一思潮是非官方、非主流的,其代表人物

① “新儒家”(Neo-Confucianism),用以指宋元明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最初是冯友兰为方便西方汉学界而使用的名词,卜德(Derk Bodde)译冯氏《中国哲学史》使之成为英译宋明道学或理学的专门用语,张君勱、陈荣捷、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等都使用之,这一术语后又返输中土。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降,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又用“新儒家(学)”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与学者。为区别于宋明理学,后来一般又以“现代新儒学(家)”或“当代新儒学(家)”指代后者。1976年,张灏的英文论文《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在美国正式发表。1982年8月1日,台北《中国论坛》杂志社在台召开“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座谈会,会议由李亦园、韦政通主持,余英时、刘述先、张灏、林毓生、金耀基等发言,对现当代新儒家的定义、范围、意义等作了广泛的讨论。一般以这一会议作为从学术上研究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滥觞。刘述先又区分前面说的一般的“现代新儒学”(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与“当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后者指熊十力至刘述先一系强调心性之学的学者。我持开放的儒学观,对现代新儒学(家)广义视之,没有这种细分。

中国大陆学者全面性地评述、研究这一思潮的著作有: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宋志明:《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郑家栋:《当代新儒学史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颜炳罡:《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郭齐勇:《郭齐勇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黄克剑:《百年新儒林——当代新儒学八大家论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景海峰:《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罗义俊:《生命存在与文化意识:当代新儒家史论》,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请读者详参。

都是在野的公共知识分子,故深具批判性与反思性,又是专家、学者兼教师,在哲学、史学与教育界等领域有着卓尔不群的建树。这一思潮发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既有终极性的信念信仰,又不与自然或科学相对立,坚持社会文化理想与具体理性,扬弃工具理性,开启了21世纪中国重释、重建传统与批判现代性弊症的文化走向,又延续至今,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继续发挥着积极健康的作用。一百年来,在西化思潮席卷全球、包举宇内的时代,国人把儒学弃之如蔽屣,洋人视儒学为博物馆、图书馆,当此情势下,有现当代新儒家兴焉,正视儒学为活的生命,真正能继承、解读、弘扬儒学的真精神,创造性地转化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资源在内的传统文化,把中华文明的精华贡献给全人类,积极参与世界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其功甚伟!所以,这一学派虽然很小,影响力有限,在台湾也是寂寞的^①,但因思想深刻,不随波逐流,值得人们珍视。

第一节 文化反省的多维性与五四传统的另一面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不是孤立产生的,它属于文化守成主义的大的范畴。文化守成主义并非中国的特产或土产,并非我们一国的文化现象,而是国际文化现象。伴随着现代化由西方向全世界推进,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几乎都表现为对西欧近代文化的普遍价值既吸纳又排拒的双向对流过程。西方和非西方皆出现了形式上反现代化而在实际上成为促成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以认同、回归民族文化传统为特点,表面上排拒,实际上吸纳西方近代文化的某些重要价值的文化思潮。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与文化民主主义思想家哈曼、谢林、赫尔德和耶拿大战以后的费希特,英国的柏克、卡莱尔,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印度的辨喜、古斯、依克巴、泰戈尔、甘地,中国的辜鸿铭、吴宓、梅光迪与后期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马一浮,以及他们的前驱章太炎,日本的冈仓觉三、北一辉、和辻哲郎、

^① 详见牟宗三、唐君毅等:《寂寞的新儒家》,台北鹅湖出版社1996年版。

西田几多郎,及非洲、中东的某些学者^①。

这些思想家为大势所裹挟,逐渐认同西方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同时提出了值得深究的两个方面的课题:其一,经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固然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的现代化,但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全盘的,并不必然蕴含文化价值层面上的全面反传统,现代化终究是各民族的现代化;其二,科技理性的过分膨胀和工业文明对整合的人性的肢解,出现了人的真实存在性的丧失并化为抽象性的危机,因此,不能不重新省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异化),特别是人的生命存在、道德境界与精神价值的问题,人性的全面发展的课题。前者是现代化的民族化问题,后者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把提出如此重大问题的思想流派排除在现代化、启蒙或五四传统之外。我们更不能认为他们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的批评都是错误的、不识时务的,实际上,批评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史华慈(B.Schwartz)认为,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出现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他们三者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而这些观念是出现于欧洲历史的某一时期”的;西方“保守主义起于对启蒙运动之主流的‘辩证的反动’”,英、德的保守主义是针对法国革命这样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的;“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可以用‘传统主义者’而不用‘保守主义者’来描述现代中国的所有这些人,如章炳麟、熊十力、梁漱溟和其他宣称过去的理念和价值对他们仍具有效的人”^②。史华慈认为,20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全盘肯定现行的社会秩序的英国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有的只是受民族主义情感所影响,肯认传统文化价值而很少肯认当时的政治秩序的保守主义(陶希圣是一个例外)。

① 参见[美]艾恺(Guy Alitto):《文化守成主义论》,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② [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论保守主义》,载傅乐诗(Charlotte Furth)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0—21、33—34页。傅乐诗主编的本书英文版《变革的限制——论民国时代的保守主义》一书于1976年在美国出版,是西方讨论现当代新儒家之肇端,收录了张灏、艾恺、杜维明等人的论文。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确立的正义、理性、自由、真理、民主等“普遍价值”观念传到落后、保守、分裂的德国,德国的知识精英如赫尔德(他自己也是启蒙思想家)等却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与“普遍价值”相对抗,反对把世界文化同化于法国文化的“普遍形式”,甚至认为只有区域性、民族性的价值和偶发的原则,而没有什么普遍价值与永恒的原则,只有特殊形式的人类而没有普遍的人类,以此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我们这里不去讨论赫尔德文化哲学的问题,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赫尔德在德意志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占有显赫的一席,他的思想对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思想家都有一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化大体上经历了从“欧化主义”到“日本主义”到“和洋折衷化”的过程。明治维新运动的头 20 年,日本知识精英强烈主张“全盘西化”,甚至在外在形式上模仿西方;以后出现了“国粹保存”思潮(我国国粹派的“国粹”二字来自日本);再以后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在经营方式、引进技术设备等方面都没有全盘照搬先进国家的办法,善于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外来文化思想,甚至转而保存传统的日本生活方式。^①可见“国粹保存”思潮在日本近代(或现代)化的过程中亦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不是仅仅只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呢?不能这样看。文化保守主义同样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是文化启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理由有三:

第一,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具有多维性。

对中外文化进行多重的全面的反省,是近代中国文化处于中西文化冲突和新旧文化嬗替之际,多数知识精英所持的态度。早在五四以前,章太炎就十分重视西方的文化学术,以西方文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参照系,但又不囿于此,又十分尊重中国乃至印度文化自身的发展,将这些异质文化的不同表现,结合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认真地分别加以研究。论者指出:“章太炎不为传统文化所禁锢,不对西方近代文化盲从,对这两者都坚持了反省的态度,同时开启了两座闸门:一是激烈批评和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长期占居支配地位的正统文化的闸门;二是怀疑、批评乃至摒弃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

^① 参见刘天纯:《论外来文化与“日本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8 年第 1 期。

取向、行为模式的闸门。双重的反省,有助于寻觅中国文化自身近代化的特殊道路。”^①尽管章太炎自己后来也不能驾驭这两股潮流,但至少说明五四思想家的前辈已具有这种慧识:对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多重反省。

五四时期是多元的外来文化与多元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渗透、涵化和整合的时期。五四时期的文化开放及其多元趋向,被后世的史家大大地简约化了。对五四运动持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的研究者,几乎都相当一致地对五四传统作出了单维性的诠释。在我们看来,五四传统或五四思潮显然不仅仅包括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而且包括民族主义、文化守成主义(或传统主义);尽管以上每一思潮的内涵相当复杂,边界不易确定,相互搏击又相互发明,相互交叉又相互渗透,变迁频繁,然而这几大思潮的存在及其对后世(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国学热)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

五四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彼时每一思潮、流派内部与外部争鸣的复杂性,多样的外来文化与多样的本土文化涵摄、结合的丰富性,为我们今天发展新文化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性和广阔的文化背景。历史的客观进程是永无止境的,传统(包括五四以来近百年的新传统)的多重意义和价值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作为五四主潮的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的反传统及全方位开放,冲破桎梏,吸纳西学,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功绩^②,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不能涵盖文化反省的全部意义。反传统,揭露传统的痼癖,鞭笞国民性格的阴暗面是文化反省的首要前提和重要方面;通过洗礼,重新认同传统,发掘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同样是文化反省的重要方面。“百事不如人”的虚无主义尽管事出有因,但毕竟不可能做到健康、全面地体认传统。

既然从“前五四”到五四到“后五四”,对中西文化进行双重乃至多重的反省已构成百多年来文化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我们当然不能把文化守成主义排

① 姜义华:《章太炎与中国文化的新旧嬗替》,《文汇报》1986年7月22日。

② 详见郭齐勇:《五四与“文革”二题》,《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文化多元论纲》,《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斥在新传统之外。

第二,“从离异到回归”的导向具有规律性。

无论是从一百多年来各领风骚、相互取代的不同思潮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还是从近现代众多思想家自身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从批判到认同,从离异到回归,几成普遍现象。思潮的更迭,不必贬斥为“不是东倒就是西歪”的恶性震荡,实际上每一次循环,都提扬到了新的高度。至于思想家们,如严复、梁启超们的回归,也不必看成是堕落、复旧,他们晚年对东西文化冲突作出的不同回应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和思想内涵。最典型的是孙中山。孙中山晚年反对盲目排斥一切传统,主张好的保存、不好的放弃,主张“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①。这实际上是他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总结。“离异”与“回归”也并非中国土产,中西双方双向对流,各有一部分人背离自己的传统,向对方所扬弃的传统靠近,另一部分人则回过头来重新省视、解释、肯定并重建新的文化传统。^②文化保守主义即出现在这样的震荡之中。

第三,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启蒙具有特殊性。

五四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最值得体味的是文化多元格局。这种格局实际上在清末就开始了。扫除蒙昧,启发民智,打破中国中心、华夏中心,以及将中国文化化约为统治阶级文化或儒家文化的痼癖,肯定外来文化的价值,也肯定非统治阶级文化或非儒家正统文化的价值,这在实际上把人们的文化视野、观念从绝对主义、教条主义、一元论式走向了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价值观。五四主流派的启蒙呐喊,始于多元,终于一元,打破了一种褊狭,导致了另一种褊狭——不管实际上对国民启蒙有多么巨大的困难,这种思想逻辑的背反,例如把科学讲到唯科学主义的地步,把民主讲到不民主的地步,就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文化传统不同,文化启蒙的内容和方式应当具有不同的特点;世界科技、文化发展的条件不同,文化启蒙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步骤

①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② 参见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东方的黎明》,巴蜀书社1988年版;龚书铎:《论孙中山的文化观》,《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也应注意到它的特殊性。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客观上修正了主流派,坚持中西融通的兼综导向,重视不同民族文化启蒙的不同特点,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多少年来,在对近代文化和五四文化的研究中,我们总是把主张文化的“西化”或“苏化”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看作是进步的、革命的。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又是不全面的。离开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上述思潮便失去了张力。不唯如此,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对立互补要素,而且是民族文化现代化重建的重要动力之一。总之,与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相互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五四思潮和五四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节 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线索与基本内容

“前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著名代表是国粹派——章太炎和刘师培。众所周知,他们是当时社会政治秩序的挑战者。在政治层面上,他们是激进派;在文化层面上,他们则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伦理精神的危机作出了保守主义的回应。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本土文化的阐扬都非常之驳杂。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所提倡的“保存国粹可以强国”的思想影响下,1904年冬,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组织了“国学保存会”,次年初创办了《国粹学报》。1906年,章太炎出狱赴日,号召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不久,东京留学生中成立“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旋又成立“国学振起社”,章任社长,钱玄同和鲁迅兄弟参与^①。同时,刘师培、章太炎改变《民报》编辑方针,使之变成深奥的国学刊物。在此先后,严复、梁启超转化到绍述国学的立场。

国粹派的基本口号是“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基本思路是以保文化来救国家、救民族,以国粹为立国之根本源泉。国粹派对社会进化、工业化与文化价值和道德理性的背反,表示了困惑和不安。他们从历史、语言、文化与种族的具体而特殊的关系出发,界定“中国性”,探寻文化价值之源。他们的

^① 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基本上反映了国粹派和尼采的文化观。